

引 论

编写本书的目的是为有意于了解或研究世界古代文明史的青年朋友，尤其是治本专业的研究生，提供一个入门性的指导。对于古代各文明的具体研究指导将在以下各章中分别加以论述，这里首先作一个总论性的开场白。

因为我们所要与之对话的是有志于古代文明研究的青年，他们的志趣在于研究，在于历史学的研究，在于古代文明的研究，所以这个开场也就分为以下三个层次来谈。

—

既然要从事研究，那么当然应该对“研究”有进一步的了解。首先要了解“学习”和“研究”的关系。如果从广义看“学习”，那么“学习”的意思里就包括了“研究”。例如，孔子所说的“学而不厌”^①，这就是终生治学不厌，其中当然包括了“研究”。可是，如果从狭义看“学习”，那么它的意思就不包括“研究”了。这里让我们首先辨析一下“学习”与“研究”的关系。

按“学习”由“学”、“习”二字组成，原来它们也各有其不同的意思。

现在首先来谈“学”。“学”在中国古籍里有不同的解释，稍作说明如下。《说文解字》：“学（教），觉悟也。”^②此字从“教”字来，意思是因受教而觉悟，由不知而有知。《广雅·释诂四》也说：“学，觉也。”^③此其一。又《广雅·释诂二》：“学，识也。”^④这个“识”是

《论语·述而》，见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一册，136页。以下引用《诸子集成》本，只记册数页数。

②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经韵楼版，1981，127上页。以下引《说文解字》皆据此本，只记页数。

王念孙：《广雅疏证》，卷四上，22页A。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嘉庆本，1983。以下引《广雅》皆据此本，只记页数。

《广雅疏证》卷二下，29页A。

“记”的意思，就是说，学了不仅要知道，而且要记住，要记下来。此其二。又《广雅·释诂四》：“学，教也。”^①教与学是授与受的关系，古书常有授受同词的现象，因为二者本来就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说文解字》：“教，上所施，下所效也。”^②教就是施，就是授，而学就是效，就是受。所以，学的过程又是仿效过程。此其三。这样说来，“学”就有了知道（被教会）、记住和仿效三层意思，而这三层意思都反映着人的受教过程。如何才能使受教的知识变成自己的呢？这就需要“习”。

其次谈“习”。《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指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习”字的本义是什么？《易经》坎卦由下坎上坎构成，卦辞曰：“习坎。”上下皆坎，为坎之重复，故曰“习坎”。《彖辞》曰：“习坎，重险也。”^④坎为险陷之象，所以习坎就是“重险”。据此可知，习有重复的意思。至于“习”字本义，《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习，数飞也，从羽从白。”^⑤这里的“数”读作“朔”，传统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是重复、频繁、屡次的意思，另一是急速的意思。不过，这两种解释之间也有其内在的联系，即凡鸟兽动作频率高，其速度自然也快。《尔雅·释诂》：“肃、齐、遄、速、亟、屡、数、迅，疾也。”^⑥由此可以看出二者间的关系。所以，“学而时习之”的“习”，非指鸟的“数飞”，而是“引申为凡重习、学习之意。”^⑦

如果概括起来说，由“学”和“习”两字组成的“学习”一词，所表示的就是由“学”而开始获得知识，在反复的“习”中达到切实的把握。“学习”大致相当于英文中的 learn。由“学习”再进一步，就到了“研究”的境地。“研究”相当于英文中的 study。“研究”一词，在中国早期的文献中原来也是分别用单个字来表示的。先说“研”字。《说文解字》：“研，磨（原作礪）也。”段玉裁注：“亦谓以石磨物曰研也。”^⑧所以，“研”字本指以石将物磨为粉末，而其引申义就成了对事物进行

《广雅疏证》卷四上，18页A。

《说文解字注》127页上。

《论语正义》，1页。

孔颖达：《周易正义》，42页，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十三经注疏》，1980。

《说文解字注》，页138上。

④ 郝懿行：《尔雅义疏》；“释诂”46页，长沙，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1938。

⑦ 刘宝楠：《论语正义》，见《诸子集成》本第一册，2页。

⑧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452页。

精细的分解。再说“究”字。《说文解字》：“究，穷也。”^①《尔雅·释言》：“究，穷也。”^②《说文解字》：“穷，极也。”^③《尔雅·释诂》：“究，谋也。”^④《说文解字》：“虑难曰谋。”^⑤所以，“究”就是穷极究竟，就是远虑深思的意思。《易·系辞上》：“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孔颖达疏：“言易道弘大，故圣人用之，所以穷极幽深而研核几微也。”^⑥这句话里没有直接也现“研究”一词，但是其中的“极深研几”一语，就是“究深研几”，如果换一个说法，那就是“研究深（远）几（微）的事物”。

“研”与“究”组成“研究”一词是较晚的事。《世说新语·文学四》：“殷仲堪精核玄论，人谓莫不研究。”^⑦可能是“研究”的较早出处。“研”与“究”组成一词，其实这两个字之间也是有其内容的关联的。“研”是彻底的分析、分解，“究”是彻底的探求。彻底的分析（研）是彻底探求（究）的准备，彻底的探求（究）则是彻底的分析（研）的完成。由彻底的分析而彻底的探求，这就是研究的过程。

现在再来谈“学习”与“研究”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的关系。

从总体说，“学习”是为“研究”打基础、作准备，而“研究”是“学习”的继续与发展。“研究”的成果又成为新一轮“学习”的对象，从而引起新一轮的“研究”，如此运行不已，也就是人类文化的不断进展的过程。所以，“学习”与“研究”二者在人类文化过程中是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不过，“学习”与“研究”的联系是有区别的联系：

一则，“学习”重在继承，而“研究”重在创新。

《论语·为政》：“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一句话看起来很容易懂，可是前人在解释时仍然见解不同。何晏《论语集解》：“温，寻也。寻绎故者，又知新者，可以为师矣。”^⑧按，“温”字释“寻”这在古代学者间并无分歧。而在这里如何释“寻”，就有意见分歧了。

《说文解字注》，346页。

② 《尔雅义疏》，“释言”15页。

《说文解字注》，346页下。

《尔雅义疏》，“释诂”13页A。

《说文解字注》，91页下。

⑥ 《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81页。

⑦ 刘义庆：《世说新语》，见《诸子集成》第八册，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⑧ 《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2462页。

按《集解》的解释，这里的“寻”释为“绎”。《说文解字》：“寻，绎理也。”^①可以为据。又《说文解字》：“绎，抽丝也。”^②所以，按《集解》的解释，“温故”就是从旧有的知识中去“寻绎”或者抽寻，这样就可以知新。这个思路不错，不过并没有说明怎么样就能从旧知识里抽出新知识。这是此说的不足。刘宝楠不同意《集解》之说。他在《论语正义》中说：“《礼（记）·中庸》云：温故知新。郑（玄）注：温读如焠，温之温，谓故学之熟矣，后时习之，谓之温焠，或省作寻。”^③这就是说，“寻”字与加“火”旁的字通用，就是加温不使冷却的意思，“温故”就是在旧时所学知识忘记（冷却）之前随时复习、温习，不使遗忘的意思。刘宝楠在其《正义》中还引了几家之说，大体谓温故为博古而知新为通今。^④此说坚守“温”、“寻”互训之义，以为“温故知新”就是由博古而通今，从而说出了“温故知新”的过程实际是由继承而创新的过程。这些说法也颇有可取处。不过，“温故”为什么就可以“知新”？道理也没有说出来。按“温故”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学而时习之”。学过一样知识，不时地温习它，实际可以产生双重的效果：一方面，把所学的知识牢固地记了下来；另一方面，在不断的复习中逐渐了解到所学知识是通过何种途径得来的。或者说，温习的结果，既得到了具体的知识，又得到了产生此知识的方法。如果说，人们通过前者所把握的只是具体的“事”，那么，通过后者所把握的就包括了一般的“理”了。当人们试图用所得知的方法或“理”去进一步探讨新事物时，“研究”就从这里开始了，“知新”的门也就从这里打开了。当然，要作到以上这一点，那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思”。《论语·为政》：“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按“罔”的意思是蒙蔽，用于主动的情况下是蒙蔽他人，用于被动的情况下则是被蒙蔽，也就是无知。朱熹注“学而不思则罔”云：“不求诸心，故昏而无得。”^⑤这就是说，人们在学的时候，在温习的时候，如果不能思考，那么学了也是白学，其结果必然是一无所获，依旧无知。由此可见，如果学而不习，那就不能巩固学之所得；如果学习而不思，那就不能知其学之所以得，结果仍然只能处于昏然无知状态，也就无从向研究的层次进展。《礼记·学

① 《说文解字注》，121页下。

《说文解字注》，643页下。

④ 《诸子集成》，第一册，29—30页。

朱熹：《论语集注》，见《四书章句集注》，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记》：“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郑玄注云：“记问，谓预诵杂难、杂说，至讲时为学者论之。此或时师不心解，或学者所未能问。”^①所谓“记问之学”，就是耳食之学，从他人问得知识而未心解，把这样没有真正理解的所谓知识写成讲稿，背熟了，到上课时照本宣读，毫无新义。这样的人，学的时候就没有用心思考，更没有作研究，当然也就没有任何创新，所以不能为人师。在中国的学术传统里，学习与研究或温故与知新，是有明确的区别的。其间也有着重要的联系，而这种联系的纽带就是“思”。学习或继承的阶段要会思，研究或创新的阶段更要会思。

二则，由“学习”过渡到“研究”，从思维层次来说是从重肯定到重否定的发展。

现代汉语中的“学问”通常作名词用，表示“知识”或“学术成就”的意思。可是，这个名词是从动词演化而来的。《孟子·告子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②又《孟子·滕文公上》记滕文公之言曰：“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③这里的“学问”都是动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作学问”。《荀子·大略》：“《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④又“学问不厌，好士不倦。”^⑤他这里所说的“学问”，仍然是指作学问。而《荀子·劝学》：“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⑥这里的“学问”就和“天”、“地”一样是名词了。先秦儒家学者很注意把“学”和“问”结合起来作为治学的根本，的确是很有道理的。“学”为什么必须继之以“问”？因为，如果无“问”，“学”就不能发展。朱熹曾训其门人云：“诸公所以读书无长进，缘不会疑。某虽看至紧要底物事，亦须致疑。才疑，便须理会得彻头。”^⑦他在论读书法时，又多次说到“疑”为熟读精思后的关键，如：“然熟读精思既晓得后，又须疑不止如此，庶几有进。若以为止如此矣，则终不复有进也。”^⑧怎么样去“疑”呢？朱熹的答案是：“读书，须是看他那缝罅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见《十三经注疏》，1524页。

焦循：《孟子正义》，载《诸子集成》本第一册，464页。

焦循：《孟子正义》，载《诸子集成》本第一册，193页。

①⑤ 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本第二册，334页。

⑥ 《荀子集解》，1—2页。

⑦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21，2931页，北京，中华书局王星贤校点本，1988。

⑧ 《朱子语类》类10，168页。

处，方寻得道理透彻。若不见得缝罅，无由得入。看见缝罅时，脉络自开。”^① 朱熹的这些话实际是告诉我们，人在学了以后要会提问题（即疑），问题从何而来？要从事物的内在矛盾“缝罅”中去发现。客观的事物或书中所说的事物，为什么会有“缝罅”可被发现？朱子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不过，黑格尔说得清楚：“凡有限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并且由于自相矛盾而自己扬弃自己。”^② 朱子所说的“缝罅”实际就是客观的普遍存在的矛盾。当然，这里所说的“疑”，并非“怀疑主义”。黑格尔说：“怀疑主义没有认清它自己的真结果，它坚持怀疑的结果是单纯抽象的否定。”^③ 中国古代学术传统所重视的“疑”、“问”，不是单纯抽象的否定，而是有分析的具体的否定，或者说是兼容否定与肯定的扬弃。

《礼记·中庸》所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宋儒程颐对此五者极为重视，说：“五者废一，非学也。”有人问朱熹：“学问思辨亦有序乎？”答曰：“学之博，然后有以备事物之理，故能参伍之以得所疑而有问；问之审，然后有以尽师友之情，故能反复之以发其端而可思；思之谨，则精而不杂，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则断而不差，故能无所疑惑，而可以见于行；行之笃，则凡所学问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践其实，而不为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④ 朱子把学、问、思、辨、行五者解释为一条有内在联系的锁链：博学多知才能有比较和参考，才能看出并提出问题；在和师友反复问难、讨论中才能使问题深入，才能引人深思；经过深思，才能辨明是非，才能确定取舍；明辨是非取舍，才能笃行而无疑。在这五项中，学为学习的阶段，问、思、辨三者为研究的阶段，行为实践阶段。行当然不是学与问的过程的终结，而是新一轮学与问或者学习与研究过程的开始。

人类文化的进展，是在不断的学习与研究的过程中实现的。没有对

《朱子语类》，卷 10，162 页。

②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177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小逻辑》，181 页。

宋·朱熹、吕祖谦撰，清·江永集解：《近思录》，卷二，36—37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94。

前人成果的学习与继承，那么人类就必须永远从零开始，那也就和其他动物一样不能有任何文化，实际也就不能成其为人类。同样，没有对于前人所传下来的文化遗产的分析与思考，不否定其中的错误与缺陷，那么人类的文化就会永远停留在开始打造石器时的水平上，也就不能有任何的文化进展。人类文化实际总是这样发展的：前人留下的成果总是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正面的积极因素，它成为后人继续前进的基础；另一方面是反面的消极的因素，它为后人提供了怀疑与思考的材料，否定了这种因素或回答了前人留下的问题，这样文化就又前进了一步。所以在人类文化的进程中不仅永远有肯定与继承，同样永远有否定与批判。大体说来，学习重在继承与肯定的方面，而研究则更重在批判与否定的方面；当然，如就文化进展总体而言，那就是肯定的继承中始终包含了否定，而否定的批判（按照辩证法本来意义上的批判）本身就包含了肯定与继承。

以上说的都是关于学习与研究的一般道理，也许有人看了会觉得与古代文明史的研究关系不大。这样说也不为不可。不过这一本书是为了帮助青年朋友步入研究之途，而研究首先需要的是眼界开阔和思想活跃。因此，开始作一点“务虚”，可能对以后是不无小补的。以下具体论述到历史学研究的层次。

二

现在谈谈有关历史学的研究的问题。当然，这里不可能泛论历史学研究的各个方面，而只是重点谈如何由历史学的学习过渡到历史学的研究的问题。目的仍在于帮助有志于历史学的青年朋友更有效地走上历史学研究之路。以下分两个方面来谈：

（一）首先，历史学的学习不能不从记忆开始，但是要作研究，又不能只靠记忆，而是要由记忆而理解，由理解而提出问题，而且只有在提出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历史学的研究才得以实现。

为什么治历史学必须从记忆开始呢？看来这与历史学这门学科的特点有关。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人类历史的客观过程就与记忆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其他动物，甚至高级动物，都凭本能适应自然，它们每一天、每一代都从头开始，没有记忆以及在记忆基础上形成的任何进展，它们也就无历史可言。人类则不同。人类从打制第一把石

斧起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劳动，并且凭藉记忆，把经验和技能逐渐传下去，从而形成了文化的进展，并出现了历史的过程。人类的历史和文化不仅藉记忆而发生，而且也赖记忆而继续发展；假如人类在今天失去了记忆，历史和文化也就会从此中断，明天的一切就必须重新从零开始。因此，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对象就是赖记忆而在时间中延续的流。另一方面，历史学本身又与记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历史学以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为研究对象，而历史进程本身已早成过去，它已经消逝在时间之流中。因此历史学家就不能像天文学家那样可以直接面对宇宙星空的运转，也不能像经济学家那样可以直接面对社会上万千的经济活动。历史学家既无法直接面对已成过去的历史过程，那就不能不藉助于人们对于以往历史的记忆。所幸客观历史过程的消逝并不等于一切均已消失，它仍然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并且不断地流传下去。这种记忆在不同时期与不同条件下，以不同形式呈现，当然最大量也最重要的是保存在以文字所作的记录中。因此，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客观过程的根本媒介——历史资料，没有这种资料，历史的研究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必要的条件——也是赖记忆而存在的。

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历史都是从记忆开始的，也都是靠记忆继续的。幼儿在幼儿园里听老师说历史故事，在脑海里留下了最初的关于历史的印象；在小学和中学里，青少年们上了历史课，读了一些课内课外的历史常识书籍，逐渐对历史有了一个大体轮廓的知识。这些知识基本上都是靠记忆形成的。其实，从古代起，人们关于历史知识的世代相传也是从记忆故事到记忆历史这样的过程里延续下来的。

即使已经从历史学的学习阶段进到了研究阶段的人，对于历史知识的记忆仍然是相当重要的。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位历史学家学问的大小是和他所掌握或记忆的历史材料的量成正比的。我们大学里历史专业的学生，已经是从历史学的学习向历史学的研究过渡中的人了（大学生，如按英文就是 *student*，就是从事 *study* 的人了）。他们还是需要掌握或记忆更多的历史知识。即使是已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他们也不会停止扩充自己的历史知识的努力。记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永远都是重要的。

不过，在我们对记忆对于治历史学的重要性作了充分说明以后，接着就不能不说明单纯依赖记忆的局限性了。

过去有一种偏颇的看法，以为历史课本从小学到大学的变化，就在

于知识含量的不同，而学生水平的区分也就在于其所记忆的多少。知识记忆量的水平变成衡量学生业务水平的唯一标准。按照这个量的标准，小学历史教科书里所讲的是不系统的历史小故事；中学历史教科书里讲的是稍微系统的历史中等含量的故事，或简称中故事；大学历史学专业的教科书里讲的是较为系统而详细的故事，或者简称为大故事；而学习的方法，一例都是死记硬背。这样下去，到了硕士研究生阶段又该怎么办呢？还是老师讲故事再让学生去死记硬背？不同处只在把故事讲得更详细、更系统？这样的故事如果要简称又该怎么说呢？也许可以叫做老故事。可是，老故事还有谁愿意听、谁愿意背呢？而且背下来又有什么用呢？就像照相馆里的照片，同一张底片，你可以把它放大成二寸、四寸、八寸或十二寸，它们就分别相当于小学、中学、大学或研究生所学所记忆的历史知识含量的比例。这样的相片在机械性的场合大概不会无用，但是如果作为艺术或学问，谁会欣赏、研究它呢？过去有人认为，大学里所学的历史课程必须在知识含量上比中学教科书多。因为只有这样，在大学里毕业的学生去教中学，自己有了一桶水才能给中学生一杯水。这样的说法，就知识量的角度说，不能说是没有道理。可是，其问题是，此说只看到了知识量的区别，而无见于知识质的区别。一桶水虽比一杯水多，但有尽时；历史知识的一时之多，也有其老化之时。如果不从知识的质上多多着眼，历史的学习总在记忆的量上打主意，那么，历史学的危机就真地要到来了。其实，当我们开始谈记忆的时候，就已经伏下了一个问题。记忆的条件是什么？不理解，真能够记忆好吗？过去在私塾里读书的儿童，开始只认字、读书、背书，老师并不给他讲解所读书的意思。这样背书也能背熟，记忆得很牢。但是如果以后他不能理解其中的涵义，那么他所背的书就白背了。不过，就在这样的私塾里，也可以看到不同的儿童背书的速度很有不同，有人说这是记忆力差别造成的。其实，背书快的孩子大多会想办法去弄懂所学书的意思，于是背的效果就好，而背得慢的孩子则大多不懂书的意思。一个人的记忆能力从来就是与他的理解能力成正比的。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一下理解对于历史学的意义：一方面，历史学的资料都是前人记忆的成果，它们以文献、遗物等等形式保存并流传下来。前人对于客观历史过程中的事情，有些是在无意中记忆下来的，但这样的记忆一般不能保存很久，因为它未必有意义；而大多数都是在有意的情况下记忆下来的。人们的有意识的记忆又主要发生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一种是，人们

深切地理解到该事件或过程对于自己的重要意义，从价值系统认识到记忆此事件或过程的必要性，于是产生了极大的注意力；另一种是，人们对于该事件或过程的内在结构和外部关系有深切的理解，从知识系统具备了记忆此事件或过程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今天所能接触到的前代的史料，都是前人根据自己的理解而记忆下来的、他们认为最需要也最清晰的事件或过程。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或过程太多而且太纷繁，人们不可能也不必要把它们全记忆下来，于是前人就根据自己的理解去作选择取舍；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或过程都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去加以考察并评述，前人又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因此，我们就不得不透过前人的理解去认识前代的客观历史过程。另一方面，我们今天学习前代历史，一旦从记忆的阶段进理解到理解的阶段，我们作为认识主体也就从被动的接受转到了主动分析状态，我们自然也必然会按我们的理解去认识并分析前代的历史。可是，在我们的理解与前人的理解之间，通常会有相同或相通的方面，不如此就会发生我们与前代历史文化之间的断裂；同样，通常也会有不同或疏离的方面，不如此就不能有历史的发展。因为在前人与我们之间必然存在着理解上的异同，所以历史学研究中总不断会有问题的出现。研究总是从问题开始的，而研究成果所达到的水平是与研究者所能提出并解决的问题的深度密切相关的。以上我们曾说，一位历史学家学问的大小，是和他所掌握或记忆的历史资料的量成正比的。那么，在这里就必须说：一位历史学家学问的深浅，是和他所提出并解决问题的深度成正比的。前者所涉及的是量的问题，而后者所涉及的则是质的问题。历史学的发展中总不断有问题的提出，于是也就有不断的进展。所以，历史过程如长江大河滚滚向前，一方面是“大江茫茫去不还”，“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历史上的人与事都早已成为无生命的过去；另一方面是“不尽长江滚滚来”，“不废江河万古流”，历史过程本身却常在常新。人们在常在常新的历史之流中不断反省过去，于是业已消逝的过去在历史学之流中也常新。历史学的生命，就寓于这两种流（作为客观过程的历史之流与作为人类文化过程的历史学之流）的常在常新之中。

（二）再则，治历史学，从学习到研究，不能没有传承（或传统，tradition），也不能没有创新（或革新，innovation）。在学习历史学的时候，比较地着重于传承；在研究历史学的时候，则更着重于创新。

其实，治任何学问都不能没有传承，即使是当今创新最快的电子技

术，也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电子学的学者，最需要走向学科发展的前沿，某些三年前出版的书就因落后而不值得再参考了。当然，即使如此，一年以前甚至一个月前出版的书中的成果对于新的发展来说仍然是其出发点或基础，其间仍然有着传承的关系。不过，治历史学更侧重于传承。研究历史学的学者，不仅要读最新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走向学科发展的前沿，而且对将近千年以前的司马光著的《资治通鉴》、2000 多年前司马迁著的《史记》，甚至更早的《尚书》等等，也不能不读。这和自然科学研究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那么，这种不同产生的原因何在？

因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本身就是一条文化传承之流。郭象在《庄子·天运》篇注中有一句非常出色的话：“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①这就是说，一切当今之变皆是百代之流中的一环，皆承百代之流而来；而百代之流作为一个过程，又都是一切当今之变的会合，并在不断的当今之变中延续下去。历史上的每一时代中的人和事都处在其当今之变（只有变的大小之异，而无绝对不变之理）中，而其所承则是历史的百代之流；至若历史的百代之流，则为不断的当今之变的会集或结果。客观的历史过程既然是在传承之流中形成的，那么治历史之学者又怎能不注重传承本身呢？如果我们研究历史的学者也嫌三年前的书太陈旧而不读，那么就只能断送了历史学的根本，而不是研究历史学了。

历史之学既以传承为基础，那么又有什么必要去创新，而且创新又是否有可能呢？让我们先来谈历史学研究创新的必要。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我们研究前代的历史，必以前代当时人所记忆或记录的资料为原始的根据。在这些记忆或记录里，有些是前人和我们所共同关心的内容；但由于时代的变迁，也就有了前人所关心而我们却并不重视的事情。例如，在中国古代史书里有大量关于忠臣、烈女的事迹的记载，因为当时认为这些都是人伦大事，非详记不可；而这些对于今人来说，已经时过境迁，不在话下了。同时，又有许多事，在前人看来是不重要因而不值一提的，而我们今天却视为大事，很想知其究竟。例如，古代史家一般都很重视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事情，从而也重视帝王将相的作用，对这些着墨最多，而对于社会经济以及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却藐然视之，很少涉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ucy-

郭庆藩：《庄子集释》，见《诸子集成》本第三册，233页。

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无疑是古代希腊史学史以及世界史学史上的一部名著,可是如果想凭此书来研究古希腊的社会经济史或劳动者的历史,那么所期望得到的就只能是失望。在人类现实的历史过程中总有这样一种看来几乎是悖论的现象:由于实际生活过程的事情太多而且太复杂,人们只有淘汰了大量的事情以后才有可能把少部分自己视为最有价值的事记忆或记录下来。历史上所有的档案材料,都是经过精选和删削的子遗。从前皇帝的《起居注》本来就已经是有选择的记录,由《起居注》而《实录》又经过一次选择和删除,由《实录》而《本纪》更是一次选择和删节的结果。我们读“二十四史”中的诸帝王的“本纪”,常会感到想知道的事其中没有,而无足轻重的事又累牍连篇。因此,不论在中国或外国,都曾发生了要变帝王将相的历史为人民史的创新过程。另一方面,不仅古今记事之重点内容不同,而且对于历史事实的解释也往往有异。造成这样的差异的原因不外两端:一是文化或知识程度不同所致,例如古人常以天象的变化说明历史变化的原因,这在今天一般就没有可能了。二是价值标准不同所致,例如古人常以古礼为标准来衡量其时的人物与事件,而那些古礼在今人看来甚至可能是无法接受的。因此,历史上一代一代人总是要不断地以自己的标准来重新解释历史,这样就不断地在历史的见解上有所创新。

现在,再让我们谈谈历史学创新的可能性问题。这个问题也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在历史资料方面创新的可能性与在历史解释方面创新的可能性问题。

先说历史学研究中历史资料领域创新的可能性。过去总有一种看法,以为既然研究的对象在古代,那么一定是越近古的材料越近真、越可靠,越是近古的人对于古代所知越多,也就是说后代的历史学家在知识上永远比不上前代历史学家。这样的看法,在各种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应该说是合理的。因为,一般说来历史上的记忆或记录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流失或淡忘。可是,在条件有变化的情况下,这样的看法就未必为真了。这里所说的条件变化首先就是研究手段与技术条件的变化。例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时代上远比我们距离古代埃及、巴比伦更近,而他在其名著《历史》(*History*)中对于这两个古文明的记载是很零星且难以凭信的。因为他所取材的方法是收集传说,而当时的传说与远古历史的真实已相距甚远。自从 19 世纪以来,随着语言学和考古学的长足发展,历史学家不仅得到了希罗多德看

不到的大量实物材料，而且看到并读懂了他所无法看到的文字记录。于是现在的近东古代史知识，是希罗多德所望尘莫及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有关学科的发展，前人视为无用之物的材料中所蕴藏的历史文化信息逐渐充分地被析取出来，于是当代的历史学家完全有条件获得大量前人无法得知的材料。不仅如此，在前人已有的材料中，我们今天也有条件比前人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所以，在历史资料方面的创新现在可以说方兴未艾。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掌握多学科的知识并在交叉学科的启发下更好地达到这种创新。

再说历史学研究中解释领域的创新的可能性。历史学进展的过程，既对于历史过程叙述的延续，也是对于历史过程解释的延续；历史的叙述中不可避免地包括了解释，历史的解释从来也离不开叙述。前人对于他们当时的事的叙述，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是原始的史料，是我们必须充分予以重视的。但是前人在叙事时的解释是否正确，就有待后人的分析和检验了。例如，西周时期的《尚书·吕刑》里说了“皇帝”（颡顼）的一个故事，说他“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①这句话是叙事，说的是颡顼命令重和黎两位官员断绝了天地之间的通道，没有人再能上（格）下（降）。当然其中也包含了一种解释。可是到了春秋时期，许多人就不知道怎么样解释这句话了。《国语·楚语下》记：“（楚）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不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楚昭王按《周书·吕刑》原文字面作了自己的解释，以为重和黎断绝的天地通是物质的人行通道，所以才会以为未绝天地通之前的人能够上天，又从而表示怀疑。观射父则另有解释，他说绝地天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上古时“民神不杂”，一般人民不直接和神打交道，专门有负责宗教祭祀的人（如巫觋之类）和神往来。后来“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家家祭神，人人成巫，这样就乱了套。所以，颡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②原来颡顼只是分别命令重和黎各自专管神（天上）的事及民间（地上）的事，从而恢复了从前人民不直接和神打交道的传统，这就叫做绝地天通。按照观射父的解释，所绝的天地之间的“通”，就

孔颖达：《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本，248页。

《国语》，《四部备要》本，卷18，1—2页A，上海，中华书局。

不是人民可以缘之爬上天的物质通道或梯道，而是一种人和神打交道的精神通道。观射父在时代上晚于西周，而他对“绝地天通”的解释却在水平上高出西周很多。这里没有完全引用观射父所说的原文，因为文字长且复杂，如果细读其原文，我们就又会发现其中仍然有对神迷信的成分，这在古人本来是不足为怪的。假如我们现在再以人类学的方法分析观射父的话，那么肯定还会在解释上取得更大的进步。

我们说后人在历史的解释上有创新的可能性，这主要有两方面的根据。其一，从人们所面对的客观的解释对象方面来看。历史上的种种事情，甚至看起来很单纯的事情，都是有其多方面功能与联系的，而且都有其多层次的结构；人们在不同时期与不同条件下论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往往只会接触到其中的某些方面与某些层次。后人所生存的社会不同于前人，或者说后世的社会通常较前代复杂，因而后人思考问题的角度在方面上会复杂得多，在层次上也会深入得多。譬如观射父对于天地之间的“通”，就除了物质的通道又思考到精神的通道，从而在解释上有了创新。其二，再从人们作为解释者的主体来看。解释能力的发展是随知识的增多和加深而发展的。对于客观历史过程中的事情的诸多方面和层次的认识程度，与人类的知识与理论发展程度是成正比的。譬如，人们对于历史运动过程及其动力的解释，在不同历史时期是颇有不同的。最初，人们往往只看到了事情的偶然性，后来才逐渐思考到其规律性的问题；有了规律性的思考以后，就进一步有了必然性与偶然性关系问题的思考，如何认识历史运动的规律又在不断的进展中。人们对于历史的解释能力现在已经远远超越前人，不过并未也永远不会有止境。人类知识与理论水平的发展是无限的，这也就说明了历史解释创新的无限性。

以上，我们对历史学研究中的传承与创新作了探讨，现在有必要再对这种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人们通常会有一种看法，以为传承（传统）与创新之间存在的是相互对立并相互排斥的关系：要创新就不能不破传承，要传承就无法再创新。从而完全否定了二者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在这样的认识的影响下，人们就可能出现两种极端的倾向：重创新就不重传承，或者重传承就不重创新。应该说这两种倾向在当前的历史学界都是存在的。

需要冷静考虑的是，不在历史学的基本功上投力量，不奠定深厚的学术基础，对原始文献没有必要的功力，对学术前沿的状况及其产生背

景没有基本的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抓一些热门话题并用一些风靡一时的学术词语构造出自己的历史学体系，这样貌似“创新”果真能是新吗？没有坚实学术基础的作品甚至不具有实际的生命力，最多是昙花一现，还能算什么创新呢？一切尚未钻进去就想起飞的学术幻想都不能带来真实的学术进展，因为那实际不是学术的起飞，而是飘了。真正的学术起飞的结果是使学术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新的起点，而飘则是随风而去（gone with the wind），其结果是不知所终。另一方面，一些坚持传统功力的历史学者孜孜不倦地为学术的进展作着脚踏实地的积累工作，也许由于对学术中出现华而不实现象的反感，他们对于历史学研究的新取向、新方法缺乏热情。其实，华而不实的“新”的出现，正是因为有了货真价实的新存在，就像一切赝品都由于新的正品出现而冒充正品一样。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因为讨厌新的赝品而迁怒于新的正品。假如华而不实的“创新”可以说是过犹不及，那么，只重传承不重创新的现象是否也可以说是“不及犹过”呢？

其实，在学术的传承与创新之间，所具有的是一种相反相成或对立统一的关系。历史学的情况也是如此。真正的历史学上的创新，正如历史过程中的创新一样，是植根于传承之中的。在历史学的传承中，成果与问题同时积累下来，而创新则是这两种同时并存的积累的必然继续。因为，没有问题的积累，就没有创新的需求；而没有成果的积累，就没有创新的实际能力。真正的历史学上的创新必须有对于传承中问题的破，如不深于传承，那就不知问题究竟何在，即使知道问题的大概所在，也不能真知其深层的症结所在，从而也就不能真知往何处破，更无从破到应有的深度。中国历史上每当王朝更换时都要重新编写历史，对于前朝的人物，能抹掉不写的就不写，不能不写的就来一个性质上的大翻案，前朝的忠臣成了新朝的贼子，前朝的叛将成了新朝的元勋。这样的破看起来相当巨大而粗暴，可是一按其实质，一点新的见解也没有，不过是以粗暴的形式掩盖了旧的基本思想（忠君思想）的再现。这样破的结果是，破于所不当破，或者是破而不及要害，或名为破而实为变形的守旧。破且不能，何从创新？当然，创新不止于破，更重要的还是在于立。须知，传承所积累的条件正如垫在我们脚下的一层层阶石，它们使我们有可能达到新的高度；彻底抛弃了传承的成果，人们也就无从创新了。同样，没有创新的传承，看起来不像没有传承为基础的“创新”那样危险，不会使传承的过程本身即时消失。因此，人们会以为没有创

新的传承是可以维持下去的。其实，这也是一种表面的看法。传承从本质上说是人类文化生命的延续，而文化生命本身像人本身一样只能在不断的新陈代谢中维持下去。没有新陈代谢，没有推陈出新即创新，那么这样的传承就只能是不断弱化或萎缩下去的苟延残喘，其结果也就是最终的消亡。中国古代的某些学问不就是在不断萎缩的传承中逐渐消失的吗？真正的传承过程，就是活泼泼的推陈出新的过程。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对立统一的关系。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写过一篇论文，题为《必要的张力》(*The Essential Tensio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Scientific Research*)，其中说到最成功的科学家往往是既最深于传承而同时又是最敢于破坏传承的人。^①看来不仅自然科学界如此，作为历史学研究者，我们更需要充分地维持这种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张力。

三

在一般地谈了研究与历史学的研究之后，现在再说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的问题。因为有关世界古代文明史的具体问题将在以下各章中分别论述，这里只就有关世界古代文明史总体的问题谈以下几点：

(一) 首先简单地说一下本书所说的世界古代文明史基本范围和内容。通常在大学历史学专业里都有世界古代史的课程，也有同样内容的教科书。那里面包含着从人类形成开始的史前史以及从公元前 4000 纪后期到公元 1000 纪中期的上古时期文明史。考虑到史前时期的历史与其后的文明史有许多特点的不同，而且在研究中有许多特殊的专业要求(如考古学、古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等)，作为供有志于从事研究者参考的书自应另成专著。本书所探讨的是国家出现以后的文明史，所要论述的是世界古代的诸文明的发生、发展与衰落的内容；对于各个古代文明的史前时期，将结合各有关文明的产生来论述，所以实际也就是从论述其由史前向文明过渡的时期开始。

本书正文，首列《马克思、恩格斯和世界古代史》一章，使诸君在阅读具体历史内容之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有一大体的了解。

^① *The Essential Tension*,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 227.

然后按分区的方法论述具体历史，包括古代埃及、西亚、南亚、地中海地区的希腊与罗马诸文明的历史。东亚地区的中国当然是世界古代文明史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只是因为在我国中国历史另有专业设置，本书未再作专章具体论述。应该说明，在我们对世界其他古代文明进行研究的时候，中国古代文明始终应该是我们必用的参考系。关于这一点，以下还会有所论述。

（二）要作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当然首先要了解这门学科在本国发展的概况。因为各个具体地区古代文明的研究历史将在各有关篇章中介绍，这里只说一些总的情况。

从清朝晚期到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人在了解西方的历史方面作了很多的努力。主要的成绩是翻译了一些外国的历史书籍，其中也有一些关于古代文化史的教材以及若干关于外国古代文明的专著，如李玄伯所译《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法国 F. de Coulange 所著，原书题为《古代城市》）、刘麟生所译《尼罗河与埃及文明》（法国 A. Moret 所著）、陈建民所译《近古古代史》（法国 A. Moret & G. Davy 所著，原书题为《从部落到帝国》）等。也有一些学者编过关于西洋古代史的书，然大体皆为据西方某一书为蓝本的编译之作。因为既缺乏基础又缺乏条件，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很自然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高等学校历史系里普遍开设世界古代史课程，这门学科迅速发展起来。^① 这 50 年又大体可以分为五六十年代与改革开放以来两个时期。

1.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强调学习苏联，也是要通过学习苏联而学习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古代史的研究。大学鼓励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学习俄文并以俄文书为自己教学的基本参考。同时，苏联历史学家的著作纷纷译为中文。最初，出现了王易今所译米舒林著《古代世界史》（苏联中学历史教科书），随后出现了日知所译狄雅可夫等著《古代世界史》（苏联师范学院历史专业教科书），缪灵珠所译塞尔格耶夫著《古希腊史》、王以铸所译阿甫基耶夫著《古代东方史》、科瓦略夫著《古罗马史》（这三本书也都是苏联大学所用的教科书）。到 1959—1960 年，又译出了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多卷本《世界通史》中的第一、二两

关于这一时期世界古代史研究进展情况，可参考于可：《世界古代史研究概述》，载陈启能主编：《建国以来世界史研究概述》，111—154 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以及各年的《中国历史学年鉴》所载的有关文章。